

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

何 忠 礼

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取士途径，经历了两汉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以来的科举制三个发展阶段。其中又以科举制度实行的时间最长，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人们对它的认识和评价也最不一致。所以自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正式废除科举制度以来，它作为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史的一个主要方面，近百年来，一直受到中外史学界的关注，至今仍然是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

一 关于科举制度起源问题的讨论

科举制度起源于什么时候，早在 30 年代中国学术界就有过一场讨论。当时，邓嗣禹撰成《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一文，将它寄给张尔田、俞大纲两位学者征询意见。不久，张、俞复函商榷。于是，邓嗣禹便将自己的文章和张、俞两人的复函一并刊登在 1934 年出版的《史学年报》第 2 卷第 1 期上。邓嗣禹在文章中说：“世人言科举之起源者，率有二说：一谓其始于隋，一谓其始于唐。唐宋而后主始于隋者渐众；而在唐时，尚二说纷陈，莫衷一是。”接着，他认为考试制度和进士科的出现，当是科举制度起源的标志，而隋代取士已“有公同考试之状，加以进士为科，实始于隋，故溯源厥始，当推及之。特因其制不彰不备，仅具刍形，故谨慎重作结曰：科举之制，肇基于隋，确定于唐。”后来，他又在《中国考试制度史》一书中再次重申了“肇基于隋”的理由^①。张尔田除了对邓嗣禹所做的结论深表赞同以外，还指出隋有进士科皆有明文，因而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是确定无疑的。以上两人都是持隋代说者。俞大纲对隋置进士科一条却“颇有疑义”，同时反对以进士科设科年代作为科举制度开始的时间，他说：“若谓科举对策之法，已为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上溯两汉为权舆。若谓朝廷开科待人，士子投牒自试，始可谓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以唐为始，不可谓肇基于隋，确定于唐矣。”明显地倾向于唐代说，并首先提出士人“投牒自试”是科举制度起源的主要标志这一极有价值的见解。

这样，科举制度起源的时间，就出现了隋代与唐代两说并存的局面。

不过，在当时大多数中外学者中，无论是中国老一辈的史学家范文澜、翦伯赞、周谷城、钱穆、陈寅恪、邓之诚、陈东原、吕思勉、吕振羽等人，或者是国外著名的中国史研究者日本的宫崎市定、美国的柯睿格（Edward A. Kracke, Jr）、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等人，大都主张科举制度起源于隋代。如陈东原在 1934 年说：“这科举制度虽确立于唐，而实创始于隋。”^②周谷城在 1939 年说：“科举制，盖取分科目而举士人之义，这个制度创始于隋炀帝时代。”^③宫崎市定在 1946 年也说：“中国的科举，自隋代至晚清，实行时间长达一千三百有余年，这是一种选拔高等官员的资格考试。”^④等等。

自 50 年代起，由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白寿彝等人主编的各种新版通史先后问世，书中继续持科举制度起源于隋代的观点，隋代说在国内史学界基本上成为定论，并贯彻于大、中、小学的教科书中。范

① 参见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台北学生书局，1982 年，8—16 页。

② 陈东原：《中国科举时代之教育》，商务印书馆，1934 年，1 页。

③ 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开明书店，1939 年。

④ 〔日〕宫崎市定：《科举》，日本秋田屋，1946 年，1 页。

文瀾在他主編的《中國通史簡編》第3編第1章《南北統一社會繁榮時期——隋》中說：“六〇七年，隋煬帝定十科舉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當即進士科。……這是科舉（主要是進士科）制度的開始。”這種將進士科的出現作為科舉制度起源的主要標志，可以說是代表了中国大多數學者的共同看法。當然，也有學者從“所謂科舉制度，就是按照不同的科目來選舉人才的選舉制度”^①這一定義出發，認為分科舉人也始於隋代，所以科舉制度出現在斯時。只有唐長孺提出了與俞大綱相似的看法，他認為唐代科舉制度的重要特點在於是否“允許懷牒自試”，而南北朝後期，已出現士人“懷牒自試”的個例，反映了當時科舉制度正在萌芽之中^②。

進入80年代，有學者著文指出：要確定科舉制度起源於何時，首先要把握住它區別於其他選舉制度的特殊本質，也就是解決什麼是科舉的問題。何忠禮在《科舉制起源辨析——兼論進士科首創於唐》一文中提出，考察整個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基本上可以概括出這樣三個特點：“第一，士子應舉，原則上允許‘投牒自進’，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長官特別推薦。這一點應是科舉制最主要的特點，也是與察舉制最根本的區別。第二，‘一切以程文為去留’。換言之，舉人及第或黜落必須通過嚴格的考校才能決定。第三，以進士科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期赴試。”^③並通過多方面的論證，認為上述特點中的“投牒自進”和考試黜落法雖然在南北朝後期已露出了端倪，但正式出現卻在唐代。隋代儘管廢除了九品中正制，實行的仍然是察舉制。至於史書所載隋代已有進士科的说法，也查無實據。因此，科舉制度正式形成的時間不是在隋代而是在唐代。至於將科舉制單純理解為分科取士之義，也不盡全面，因為分科取士僅僅是北宋熙寧變法以前之事，此後至元、明、清三代，科舉獨存進士科，就不存在分科取士的問題。

不久，金旭東、周東平兩人分別著文，對“投牒自進”系科舉制度主要特點一說提出質疑。金旭東認為：“‘一切以程文為去留’，才是科舉制的主要特點和察舉制的根本區別。”^④周東平則堅持：“科舉制是科目眾多、分科舉人的選舉制度。”^⑤後來，吳宗國也強調考試在科舉中的作用，認為科舉制度就是“唐宋以後選拔官吏的一種考試制度”^⑥。他們對科舉制度最主要特點的看法雖不盡一致，但都認為創立時間在隋代。只有金錚在《科舉制度與中國文化》一書中重申了何忠禮關於科舉制度三個特點的看法，他列舉事實，重申：“科舉制度的正式產生是在唐代（而且在唐代尚有一個發展過程），而不是隋代。”^⑦

與此同時，也有人提出了與隋、唐兩說截然相反的漢代初創說。《歷史研究》1990年5期刊登了徐連達、樓勁的《漢唐科舉異同論》一文，他們依據漢、唐兩代的選舉都有分科取士和考試的情況，提出“漢代實為科舉的初創期，唐代則系其完成期”的主張，其具體理由是：“（一）在科目體系、組織步驟、考試環節三大要素上，漢代的察舉與唐代的科舉基本一致。故察舉、科舉，一也！皆朝廷統一部署下以按科舉士、考試進用為特征的官僚選拔制度。（二）與漢制相較，唐制以懷牒自投，舉、選相分，科舉與學校的緊密結合三端為重大的發展。但其在漢與明清科舉間承上啟下，從屬於按科舉士、考試進用之制發展的總過程。（三）漢、唐科舉皆在不斷完善之中。科舉諸要素在漢代只是粗具，魏晉時期此制雖保持着發展的脈絡，却在士人和軍人集團的雙重影響下處於低潮。故漢代實為科舉的初創期，唐代則系其完善期。”

主張漢代初創說者，在國內似乎只是少數，但在國外學者中却不乏其人，如愛伯華（Wolf from Eberhard）在《傳統中國的社會階層流動》一文中，就有“從漢代下至1904年的科舉制”^⑧的說法。

二 隋唐科舉制度研究

史學界多將隋代行進士科取士作為科舉制度的開端。但對進士科創立於隋的時間，又有兩說：一說是在文

① 韓國磐：《關於科舉制度創置的兩點小考》，載《隋唐五代史論集》，三聯書店，1979年；關履權也說：“科舉是分科舉拔人才的意思。”見《宋代科舉考試制度擴大的社會基礎及其對官僚政治的影響》，載《宋史論集》，中州書畫社，1983年。

② 唐長孺：《南北朝後期科舉制度的萌芽》，《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編》，三聯書店，1959年。

③ 何忠禮：《科舉制起源辨析——兼論進士科首創於唐》，《歷史研究》1983年2期。

④ 金旭東：《〈科舉制起源辨析〉之商榷》，《歷史研究》1984年6期。

⑤ 周東平：《關於科舉制起源的幾點意見》，《歷史研究》1984年6期。

⑥ 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年，1頁。

⑦ 金錚：《科舉制度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48頁。

⑧ 愛伯華：《傳統中國的社會階層流動》，Wolf from Eberhard, *Social Mobility in Traditional China*, p. 22. E. J. Brill, Leiden, 1962.

帝开皇(581—600年)年间,一说是在炀帝大业(605—618年)年间。其中,又以持大业说的学者为最多,他们的主要根据是《旧唐书》中《薛登传》、《杨绾传》及杜佑《通典·选举典三》的记载。那么,隋炀帝为何要建立进士科呢?侯绍文提出了与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所解释的完全不同的两个原因:“第一项原因,为炀帝以政治上之需要,要征录为官治事之人才。”“第二项原因,则以当时教育制度(即学校)败坏不堪,不能培植适当人才,故不能不另建进士科,以资补救。”^①宫崎市定是持开皇说的代表,他以为开皇年间所以产生科举制度,与隋文帝废除郡一级的行政建置和收回地方辟举权密切相关:由于废郡,使自汉以来郡举孝廉的名目不能成立;由于州、县不能征辟属僚,使中央吏部掌握了任用官吏的全部权力。这样便必然要改革选举制度,创立科举制度^②。邓之诚说法与以上两说稍有不同,他说:“隋初举士,仍依九品中正制,开皇中罢废之,改为荐举。……惟荐举亦多弊,炀帝乃改革之,始建进士科。”^③

但是,同样持开皇说者,时间上也不尽相同,如岑仲勉、宫崎市定和吴宗国等人都主张在开皇七年(587年)^④。韩国磐根据《旧唐书·房玄龄传》载房玄龄“年十八,本州举进士”的时间推算,认为“进士科必须是在开皇十五或十六年时已经出现”^⑤。《中国官制通史》的作者说,开皇三年到十八年隋政府颁布一系列举人诏令,“这是隋代开科取士的开始”^⑥。持大业说者在时间上也有分歧:有人根据《通鉴纲目》所载,谓在大业二年,上文范文澜则以为在大业三年。当然,笼统地言创立于隋的人更多,如陈寅恪说:“进士试虽设于隋代,而其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实始于唐高宗之代。”^⑦台湾学者卓遵宏在全面比较诸说后,做结论谓:“衡诸众说,应以开皇七年之说较可信。”^⑧何忠礼否认隋代有进士和进士科之说,他的理由亦有二:一是遍考《隋书》和隋代文献,虽然记载了开皇和大业中所举的众多科名,却未见进士科之名,也未见进士科考试之实;二是在唐、五代文献中所载隋进士有房玄龄、温彦博、侯君素、孙伏伽、张损之、杨纂等6人,可是经过考证,除杨纂的进士身份,因文献阙如,无从查考外,其余5人不是查无实据,就是以时制比附古制,将隋代以秀才、明经科察举为官,比附成进士科登第。唐代虽有进士科开创于隋的记载,但也有进士科开创于唐的记载,所以他认为隋代实行的仍是察举制,进士科也起源于唐^⑨。

唐代科举制度是唐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且是科举制度真正意义上的开始,历来为人们所瞩目。对于科举制度确立于唐的原因,韩国磐主要归纳为当时统治者为了牢笼士人和摧垮地方上的门阀势力,将考选和任用之权集中到中央这样两个方面^⑩。卓遵宏认为这是“初唐政治环境与诸帝好尚”所致,具体来说,一是为了“拔人才,治天下,牢笼英彦,消除反侧”;二是为了“尊王室,抑豪族,扩大参与藉以教忠”^⑪。吴宗国认为,“武则天、玄宗时期,随着地主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关陇贵族和功臣贵戚集团的衰落”,才使以进士科为主的唐代科举制度得以确立^⑫。以上几人所说的侧面虽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将唐代确立科举制度的原因归纳为封建经济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所致。只有吕思勉从另一个角度指出科举兴盛于唐宋的原因,他在1940年说:“科举之制,在取士上,是比较公平的,切实的,这是人人所承认的,为什么兴起如此之晚呢?用人的条件,第一是德,第二是才,第三才数到学识。这是理论上当然的结果,事实上也无人怀疑。考试之所规,只是学识。这不是说才德可以不论,不过明知才德无从考校,与其因才德之无从考校,并其学识的试验而豁免之,尚不如就其学识而试验之,到底还有几分把握罢

① 侯绍文:《唐宋考试制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11—12页。

② [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日本同朋舍,1956年,63—64页。

③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3《隋唐五代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

④ 分别参见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本事质疑》,台北九思出版公司,1978年,4页;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520—521页;《唐代科举制度研究》,288页。

⑤ 《关于科举制度创置的两点小考》。

⑥ 张晋藩主编《中国官制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265页。

⑦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1947年,16页。

⑧ 卓遵宏:《唐代进士与政治》,“国立”编译馆,台北,1987年,7页。

⑨ 《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历史研究》1983年2期;《张损之并非隋代进士》,《历史研究》1986年3期。

⑩ 韩国磐:《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载《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年。

⑪ 《唐代进士与政治》,10—14页。

⑫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11页。

了。这种见解，是要积相当经验，才会有的。所以考试之制，必至唐宋之世，才会兴盛。”^①

唐代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大类，另外还有武举、童子举等。常科有秀才、进士、俊士、明经、明法、明字、一史、三史、开元礼等科。秀才科在唐初是诸科之首，地位最为崇高，对于其历史渊源，主隋代说者都将它视做隋代秀才科的延续。傅璇琮虽然也主隋代说，却认为：“秀才之称，唐以前就有，但与科举无关。”^②否认与隋代秀才科的继承关系。对于秀才科在唐代被废绝的时间和原因，由于史料记载抵牾，今人的看法也不一致。一种意见以为：“秀才科自贞观后逐渐废绝，至永徽二年以后，已无一秀才及第者，秀才科名存实亡。开元二十四年，复举秀才，然应者多落之，至天宝初，正式明令停罢秀才科。唐后期，原先的‘秀才合为进士一科’，为进士科所兼并取代。”^③另有学者认为，从高宗、武后起，秀才科所以渐遭废绝，除了秀才科较进士科为难考外，主要是武后推重进士科，使“国家取士导向起了变化”。自天宝初（742年）起，秀才科“已由常科改作制科”，后来即使作为制科也不再举行。到德宗建中（780—783年）前后，由于“秀才与进士在人们的称谓中多有替用”，因此出现了“秀才合为进士一科”^④的说法。

至于明经的地位，吴宗国以为从唐代前期到后期有一个变化过程：唐初，“明经科等要高于进士科”；安史之乱以后，“明经地位明显下降”；到唐后期，“明经及第者做到高官或成为名人者大为减少”^⑤。

在各种考试科目中，对进士科的研究为最多。陈寅恪以为，进士特见尊重，“实始于唐高宗时代，即武曌专政之时”^⑥。万绳楠进一步解释其中原因，他说：武则天为了彻底歼除自己的敌手“关陇集团”和“山东豪杰”，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大力发展进士科取士，遂使进士成了一个新的阶层^⑦。但是，吴宗国以为，“进士科作为‘出仕之唯一正途’，直到玄宗时期，其势尚未凝定”。通过“从宪宗到文宗（806—840）几十年的发展”，进士科方成为“地主士大夫入仕的唯一正途”^⑧。其看法又与上面两人不同。

乌廷玉和翁俊雄等对唐代科举考试的具体内容和方法、执行情况、考生来源、及第后授官和士风等方面分别做了研究。翁俊雄以为，“秀才科只存在于武德年间”，其说与傅璇琮等人迥异。又以为俊士科在唐代并不存在，所谓俊士，“只是国学学生的一个头衔”。并指出明经、进士科考试内容变化的特点是“互相渗透”，“至于高宗以后进士加试杂文，意义更加重大”，“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读书人来说，应该算是要求得比较全面和严格的”。翁俊雄还说，唐代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来源和及第后的授官情况，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在这之前，考生以生徒为主，及第后“一般皆由吏部授官”；在这之后，考生以乡贡为多，及第后，“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由地方节度使府入仕”。另外，由于唐后期进士科考试竞争十分激烈，“这势必影响到考试的风气”^⑨。

吴宗国第一次提出了唐代不仅有科举，而且还有“科目选”的问题，他说：“科目选是由吏部主持的，是选官制度的一部分，而科举则是由礼部主持的，是出身资格的考试。”^⑩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

制科随时设科，名目繁多，大多名不符实。邓嗣禹、吴宗国、唐群、丁爱华等人对制科的科目、考试办法、授官等都做了详细研究^⑪。翁俊雄《唐代科举制度及其运作的演变》一文还比较了制举与常举最主要的两点区别：“一是参加制举的举人并无资格限制，也无须参加事前的任何考试”；“另一主要区别是‘中者即授官’”。并认为：唐代制举虽然十分发达，但到后期随着进士科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就开始走向衰落，特别是到文宗大和二年（828年）以后，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武举开创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盛奇秀认为，它在唐代虽然并不真正受到重视，却“体现着历代统

①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10页。

②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26页。

③ 刘海峰：《唐代秀才科存废与秀才名目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90年1期。

④ 余子侠：《唐代秀才科考论》，《历史研究》1997年5期。

⑤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189—206页。

⑥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1945年，16页。

⑦ 万绳楠：《武则天与进士新阶层》，《中国史研究》1994年3期。

⑧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171—182页。

⑨ 参见乌廷玉《唐代的科举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1期；翁俊雄《唐代科举制度及其运作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98年1期。

⑩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98页。

⑪ 参见《中国考试制度史》、《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唐群《中国科举制度史》，陕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丁爱华《唐代制举述略》，《理论学刊》1989年5期。

治者的文武并用的原则，在科举制度史上占有重要一页”^①。汪辉才、王道成、潘孝伟等人对唐代武举的创立、考试、选用、意义和弊端等方面都分别做了论述^②。

对于唐代学校和科举之间的关系，研究者也颇不少。一般的看法是：在科举制度的推动下，虽使唐代的教育事业一度出现了新的繁荣，但由于教学内容和考试的日益脱节，阻碍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到了唐后期，学校已完全成了举人赴试的落脚点和科举的附属物，从而给唐代教育造成了危机^③。

从总体上来说，史学界对于唐代行科举取士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认为科举制比九品中正制进步，它为唐统治者招揽了人才，动摇了门阀制度，扩大了统治基础，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如邓嗣禹说：“至于有唐，一以考试为准绳，而后平民有参与政治之机会，阶级观念，赖以破除焉。”^④钱穆说：“此制用意，在用一個客观的考试标准，来不断挑选社会上优秀分子，使之参预国家的政治。此制的另一优点，在使应试者怀牒自举，公开竞选，可以免去汉代察举制必经地方政权之选择。在此制度下，可以根本消融社会阶级之有在。可以促进全社会文化之向上。可以培植全国人民对政治之兴味而提高其爱国心。可以团结全国各地域于一个中央之统治。”^⑤韩国磐认为，由于“科举制确实给予了中小地主出身的机会”，“因而也就缓和了地主阶级内部矛盾”^⑥。还有学者认为，“科举制也促进了盛唐文化”，“唐代的文苑，百花争艳，灿若群星，都和科举有一定的关系”^⑦。科举至晚唐虽然已走向衰落，但侯力对唐昭宗时期“取士方向的调整”，给予了某种程度的肯定，他说：“这种方向性的调整和执行过程中的科举变化虽未形成定制，但却为北宋的科举改革提供了历史的启示。”^⑧

关于唐代科举制度的弊病，史学界也多有论述。吕思勉一方面肯定唐行科举“实良法也”，另一方面指出其弊有两：“一则学非所用”；“一测试之以一日之短长，可以侥幸而获胜，不知其果有学问与否也”^⑨。卓遵宏说，由于“进士重文轻儒，遂使儒学衰坠”，其造成的恶果是：“以私害公，忠义气节丧失”；由于“朝廷对进士特殊优宠，全国上下亦形成重文轻武之风气，甚至以执干戈为耻，后世中国羸弱，植因于此”；由于“所习不外古代经典与文词诗赋，其他学问技艺多束诸不看，……中唐以降，中国政治未见恢宏气象，举业以外各门学术科技多停滞不进，与此不无关系”^⑩。傅璇琮一反众多学者的看法，认为唐代以进士科考诗赋，“对文学发展起过一定消极作用”^⑪。乌廷玉则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科举对文学的影响，他认为：一方面，科举“推动唐诗的重大发展”；另一方面，“科举制度是文化专制的手段，使思想僵化，脱离实际，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⑫。研究者对唐代取士不公的流弊也普遍予以关注，何忠礼归纳为：“科举制度在唐时尚属初创，还遗留着以往荐举制的种种弊端。其中，主要表现为公卿大臣有权‘公荐’举人，取士之权一归有司，新老士族仍可凭借其政治、经济优势和传统的社会地位，继续把持取士大权，科场成绩好坏，并不能成为录取与否的主要标准。”^⑬至于因科举而结成朋党，造成唐后期政治的混乱，更是众多学者经常提到的事实^⑭。

五代干戈相寻，政权频繁更替，但科举取士并未受到大的影响，制度多沿袭唐旧，惟受政治混乱的影响，科举弊端更加严重而已。因此，对五代科举的研究，多附带于唐、宋科举研究的论著之中。

三 宋辽金元科举制度研究

入宋，科举制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国内外史学界对其重视程度尤胜于唐代，专门研究

① 盛奇秀：《唐代武举小考》，《山东大学学报》1988年2期。

② 参见汪辉才《武则天与武科举制度》，《光明日报》1987年12月6日；王道成《科举史话》，中华书局，1988年；潘孝伟《唐代的武举》，《安庆师院学报》1990年1期。

③ 参见《唐代科举制度研究》，124—143页；任爽《科举制与唐代教育危机》，《中国史研究》1994年3期。

④ 《中国考试制度史》，16页。

⑤ 钱穆：《国史大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0年，292页。

⑥ 《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

⑦ 林白、朱梅素：《中国科举史话》，黄山书社，1997年，25页。

⑧ 侯力：《关于晚唐科举制度的几个问题》，《浙江学刊》1998年4期。

⑨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731—732页。

⑩ 《唐代进士与政治》，158—159页。

⑪ 《唐代科举与文学》，408页。

⑫ 《唐代的科举制度》。

⑬ 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5期。

⑭ 参见《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刘智亭《唐代科举制度及其流弊》，《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2期。

兩宋科舉制度的論著不斷問世。

在國內，1949年以前至“文革”期間，史學界對宋代科舉制度的研究尚相對顯得冷落；最近二十幾年來，始呈現出蓬勃發展之勢，僅刊布的論文就達100余篇，其中尤以朱瑞熙、張希清、龔延明、穆朝慶、何忠禮等人的研究成果為最多。朱瑞熙在《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分冊》中，對宋代科舉制度的眾多名詞，做了十分精到的解釋。張希清著有《中國科舉考試制度》^①一書，書中有关宋代科舉制度的內容，占了相當篇幅，並發表了相關論文多篇，主要有《論王安石的貢舉改革》、《論宋代科舉中的特奏名》、《宋代殿試制度述論》、《南宋科舉類省試述論》、《宋代貢舉科目述論》、《關於科舉制度創立的幾個問題》、《北宋貢舉登科人數考》、《宋代科舉鎖廳試述論》^②等。龔延明對《宋大詔令集》7卷中有关科舉詔令的存目作了輯補，先後刊登在《文獻》1997年第2、3期上。由他和傅璇琮主編的《宋登科記考》也已編纂完成，即將由中華書局出版。穆朝慶對宋代的封弥制、類省試、殿試和特奏名等問題多有論述。何忠禮除發表了一系列有关宋代科舉制度的論文外，還著有《宋史選舉志補正》^③一書。此外，在不少研究整個中國科舉制度或考試制度的專著中，宋代科舉都是其研究和論述的重點。

港台學者對宋代科舉制度的研究也非常活躍，如侯紹文、楊聯陞、李正富、楊樹藩、金中樞、羅慶球、李弘祺、何冠環等人都有這方面的論著問世。其中，李正富著有《宋代科舉制度之研究》^④，本書雖稍嫌疏簡，却是台灣地區系統研究宋代選舉制度的第一部；金中樞從60年代到80年代，先後發表了《北宋科舉制度研究》（上、下）、《北宋科舉制度研究續》（上、下）和《北宋科舉制度研究再續》（上、中、下）7篇長文^⑤，是國內外研究北宋科舉制度用力最勤的學者之一，他對發解、省、殿三級考試的辦法，考試內容和程式，考試科目變化，制度沿革，考官和錄取名額等等，都做了詳細的闡述；原香港學者李弘祺的《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⑥，是一部用英語撰寫的著作，在國外頗有影響。

在國外，以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為最多，包括宮崎市定、周藤吉之、中島敏、佐伯富、荒木敏一等老一輩史學家和村上哲見、近藤一成、平田茂樹等一批中青年學者，他們對宋代科舉制度都做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和論述，其中又以荒木敏一的成就為最大。他在業師宮崎市定發表的《科舉》和《科舉——中國的考試地獄》（日本中央公論社，1963）兩書的基礎上，經過數十載的努力，於1963年出版了《宋代科舉制度研究》（日本同朋舍）一書，是海外學者全面而詳盡地研究介紹宋代科舉制度的第一人，撰者也因該書而獲得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從1962年起，以中島敏為首的部分東京學者，以東洋文庫為基地，成立了“宋史選舉志研究會”，定期開展對《宋史·選舉志》的研究，30余年來一直沒有中斷過，其間還多次邀請中國學者參加討論，並分別於1991年和1995年出版了《宋史選舉志譯注》第1卷和第2卷，据悉第3卷也即將問世。另外，日本同朋舍還出版了佐伯富編撰的《宋史選舉志索引》，為研究宋代科舉提供了便利。

西方對唐宋科舉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國，如費正清、哈韋爾（Robert M. Hartwell）、柯睿格（E. A. Kracke）和華裔學者劉子健等人，都有研究成果問世，他們的研究角度往往有異於中、日學者。例如，關於宋代科舉制度對“政權的開放”、“社會的流動”究竟有多大作用的問題，討論得相當熱烈，頗給人以启发。賈志揚（查菲，John Chaffee）所著《宋代科舉》一書最為後出，因而具有代表性，書中運用了大量歷史資料，其中包括方志107種、中日論著131種、西方論著124種，又做圖表31張、附錄4個，用力之勤，可見一斑。但該

① 張希清：《中國科舉考試制度》，新華出版社，1993年。

② 上述論文先後刊登在《北京大學學報》1986年4期；《宋史研究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北京大學學報》1992年2期；《宋史研究論文集》，河南大學出版社，1993年；《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選集》，河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北大史學》1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國學研究》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③ 何忠禮：《宋史選舉志補正》，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④ 李正富：《宋代科舉制度之研究》，台灣政治大學，1963年。

⑤ 以上7篇文章，分別轉載或發表於台灣中華叢書《宋史研究集》11輯（1979）、12輯（1980）、13輯（1981）、14輯（1983）、15輯（1984）、16輯（1986）。

⑥ 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4年中譯本。

书作者对新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知之甚少，有些论述和统计数字因缺乏考订，颇有值得商榷之处^①。

国内外学者对宋代科举制度的研究，在系统研究该项制度全过程的同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唐、宋科举的异同。宋承唐制，当毫无疑问，讨论的焦点在于两者的异同程度如何？荒木敏一以为，宋代科举与唐代相比有9个方面的不同，即创设殿试，登第即释褐，设置别头试，实行糊名法与誊录法，确立三岁一贡制，废除明经诸科，独存进士科，废除殿试黜落制，进士科废除诗赋，改用经义、策、论取士^②。杨树藩以为，唐宋科举基本相同，“所不同者，宋有教官试”、“换资试”、“召试”、“锁厅试”、“特奏名”^③等几个方面。台湾学者宋晞指出：宋代虽然也禁止商人参加科举考试，但由于取消了唐时的门第限制，所以富有的商人就做长远打算，“自他们的子孙开始接受教育，由商而士”^④，终于改变了家庭身份。

二是关于北宋的科举改革。关履权、文元珏、何忠礼等人在分析北宋科举改革的历史背景时认为：由于宋代的政治、经济和阶级关系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使得唐以来基本上操纵在大官僚、大地主手中的科举制度，不仅有了改革的必要，也具备了改革的可能^⑤。何忠礼将北宋的科举改革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太祖朝起到真宗朝止。重点是严格科举制度，改革考校程式，提倡公平竞争，杜绝场屋弊端，保证取士权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第二阶段，自仁宗朝起到徽宗朝止。重点是改革考试内容和取士科目，纠正‘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的流弊，为封建统治阶级造就和选拔有用人才。”^⑥并认为：除了上揭荒木敏一、杨树藩等人所指出的唐宋科举不同点以外，禁止结成座主与门生之间的关系、严格控制主考官的权力、扩大科举取士名额、力图以三舍生代替乡贡进士等措施，也是宋代科举之新创^⑦。

在北宋第二阶段的科举改革中，“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时期的科举改革最受人注意。金铮以为，“‘庆历新政’从整体上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科举改革则很难说”。新政虽然失败，但从此“策论的地位和重要性大大加强了”^⑧。对照宁变法时期的科举改革，张希清、金铮、近藤一成等国内外学者都有专门研究，基本上肯定了罢废明经诸科，独存进士科，废除诗赋，以经义、策、论取士，实行三舍法等积极意义，但对王安石企图以《三经新义》来统一思想的做法，评价却截然不同。张希清对此做了肯定，以为：“王安石之所以要通过贡举改革来‘一道德’，则是为变法制造舆论和提供思想武器。”“司马光等人加给‘三经新义’的罪名，以及近人责备王安石禁锢思想自由云云，都是没有道理的。”^⑨金铮则予以否定，他说：“元明清三代以程朱一家之说严酷统制知识分子思想，也由王安石用《三经新义》、《字说》等统制学校、科举而开其端。”^⑩此外，还有人提出，北宋自庆历以来所倡导的以经义、策、论代替诗赋取士，对文学影响很大：其积极的一面是“有助于以理道和时事之质实委弱之文，并直接纠正了科场及文坛上的不良风气，从而促进了北宋的诗文革新”；其消极影响是“罢诗赋，行经义，以致于禁毁文学作品，摧残文学之士，一反唐以来重诗赋的文学风尚，从而阻碍了文学的发展”^⑪。

三是对有关制度的实施办法和推行时间的研究。与唐代比较，宋代在科举中推行了一系列新的制度，主要有禁止结成门生和座主之间的关系，禁止“公荐”，禁止举烛夜试，实行殿试、锁厅试和别头试，试卷推行封弥

① 贾志扬：《宋代科举》，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如本书第5页说，中国的科举制度建立于公元589年（开皇九年），可谓毫无根据。第51页说，“初级考试的录取者，即举人”，这是与明清举人混为一谈。此外，如将落第者称为“破落户”，将发解试说成为“检定考试”，将始行别试的时间说成在大中祥符元年。如此等等，显然都欠确切。

② 荒木敏一：《宋代科举制度研究·前言》，日本同朋舍，1969年。

③ 杨树藩：《宋代贡举制度》，《宋史研究集刊》4辑，台湾中华丛书，1969年。

④ 宋晞：《从科举与舆服制度看宋代的商人政策》，《宋史研究集刊》7辑，台湾中华丛书，1974年。

⑤ 参见关履权《宋代科举考试制度扩大的社会基础及其对官僚政治的影响》，《宋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3年；文元珏《论宋朝贡举制度的发展》，《湖南师学院学报》1983年4期；何忠礼《论科举制度与宋学的勃兴》，《中国史研究》1991年2期。

⑥ 《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

⑦ 参见何忠礼《试论北宋科举制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⑧ 《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116页。

⑨ 《论王安石的贡举改革》。

⑩ 《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117页。

⑪ 巩本栋：《北宋进士科举改革与文学》，《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1期。

譽錄之法，設置特奏名（恩科），對考官進行鎖宿，定三歲一開科場和殿試不再黜落等。對上述各項制度的實施辦法，都有專題研究。其中，關於殿試創立時間，由於所據史料不同，所以頗多爭論，主張創立於武則天時期和創立於宋太祖開寶六年（973年）的學者幾乎各占一半。但是，侯力對上述兩說皆不同意，他說：“武后天授元年的‘殿前試人’因史料模糊，確難成殿試之定論。但（唐昭宗）乾寧二年的進士科復試，應該看成貢舉殿試之肇始。”同時認為，“恩科”也始於唐昭宗時期的“五老榜”^①。嘉祐二年（1057年）廢除殿試黜落制的原因，荒木敏一、金中樞、張希清等都認為是由多種因素綜合而成的^②。何忠禮提出，殿試不再黜落一人是從元祐年間（1086—1093年）開始的，在此之前，若試卷雜犯仍要遭到黜落^③。對於省試始行封弥的時間，金中樞、穆朝慶等人主張在咸平二年（999年），何忠禮則以為是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④。

四是对宋代制科、词科和武举的研究。宋代制科与唐代相比甚不发达，专门研究的论著不多，其中以聂崇岐的《宋代制举考略》^⑤、林瑞翰的《宋代制科考》^⑥两文较为重要，特别是聂文，对宋代制科的沿革及科目、考试办法、科分及待遇都作了详细研究和论述，最有价值。聂崇岐还著有《宋词科考》^⑦，对词科沿革、应试资格及手续、考试情况、等第及待遇、登科官职录等，也都有出色的考证和论述，迄今仍代表宋代词科研究的最高水平。武举自仁宗朝设立后，由于受轻视武人的影响，不为朝野所重视，后人对它评价不高。不过，杨康荪通过对宋代武举的沿革、各级武举考试研究后认为：尽管宋代武举比不上唐朝，也没有选拔出一个类似郭子仪式的武进士，但作为科举的一项内容，“宋代武举在唐代基础上的制度化发展，它对以后明代武举的进一步完善，也有承上启下之功”^⑧。

五是对南宋科举的研究。南宋科举是北宋科举的延续，除了普遍建立固定的贡院、最终确立以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两科取士的原则、科场竞争更加激烈、考试中徇私舞弊的现象更加严重以外，其他与北宋相比少有变化。因此，除穆朝庆、张希清等人先后对南宋新出现的类省试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梁庚尧对南宋兴建贡院的历史背景、分布情况有专文论述以外^⑨，其他的研究成果不多。新近出版的《南宋史稿》^⑩虽设专门章节对南宋科举做了论述，但限于体例，也不够深入。

六是对宋代科举制度的评价。在历代科举制度中，对宋代尤其是北宋科举的评价最高。金诤说：“北宋科举比唐代发展得更为完备、公平，比之明清已走向僵化腐朽的八股科举更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北宋科举是中国科举史上所可能达到的最合理阶段，大批卓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由此脱颖而出。”^⑪何忠礼对宋代科举在培养人才、改善政治、推动文化教育的发展等方面的贡献，也做过一系列论述^⑫。杨树藩还为宋代科举考试仅限于文史范围做辩解，他说：“彼时科学未明，其科目惟有如此，吾人不宜以课目之不合科学而厚非古人也。”^⑬

宋代科举除了存在着唐代科举的某些弊病以外，一般学者认为，它的突出问题是取士太宽，从而造成了冗官之患。但也有学者认为，两宋科举所取正奏名进士和诸科人数并不多，造成当时冗官的原因，主要是恩荫所致，当然与特奏名过滥也有一定关系^⑭。关于科举与两宋朋党的关系，邓嗣禹说：“宋之朋党，见于科举者，不

① 《关于晚唐科举制度的几个问题》。

② 分别参见《宋代科举制度研究》（上、下）、《北宋科举制度研究》、张希清《宋代殿试制度述论》。

③ 参见何忠礼《宋代殿试制度述略》，《中国史研究》1988年1期。

④ 分别参见《北宋科举制度研究续》（下）；穆朝庆《宋代糊名法和誉录法的若干问题》，《中州学刊》1983年5期；何忠礼《宋代封弥制考辨》，《杭州大学学报》1987年3期。

⑤ 聂崇岐：《宋代制举考略》，收入聂崇岐《宋史丛考》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

⑥ 林瑞翰：《宋代制举考》，《宋史研究集》16辑。

⑦ 收入《宋史丛考》上册。

⑧ 杨康荪：《宋武举述略》，《中国史研究》1985年3期。

⑨ 梁庚尧：《南宋的贡院》，《中国史学》1卷，1991年，日本史学会编。

⑩ 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⑪ 《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110页。

⑫ 参见《试论北宋科举制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论科举制度与宋学的勃兴》、《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

⑬ 《宋代贡举制度》，272页。

⑭ 参见何忠礼《北宋扩大科举取士的原因及与冗官冗吏的关系》，《宋史研究集刊》1辑，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5期；穆朝庆《论宋代的“恩科”制度——兼评宋代的养士政策》，《中州学刊》1991年5期。

在应试之人，而在主试之官。皆是一朝天子一朝人，同己者取，异己者黜。”^①何冠环的看法却与之相反，他通过对太平兴国三年（988年）胡旦榜进士借同年关系结成朋党的经纬做了研究后，得出结论说：“科举制度的衍生品——同年关系，在许多时候，是朋党产生的温床。”^②

辽金元三朝的科举，无论与唐宋或是明清相比，一般都认为处于低谷时期，相关论著较少。在研究整个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史的著作中，除邓嗣禹的《中国考试制度史》一书对其有较详细的论述外，其他各书大都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在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中，以杨树藩、杨若薇、都兴智、赵冬晖、姚大力、特洛舍等人的研究较为突出。

杨树藩在《辽金贡举制度》一文中对辽朝科举的起始、程序、科目、取士人数、登第初任官职等，都做了详细考释，认为“辽之取士，不仅仿唐，且又法宋”，但“契丹人不许应进士举，违者严处”。他通过对辽金科举制度的研究后得出结论谓：“一、武力之强弱，足以决定政权之兴替；二、文化之高低，方能决定民族之继绝。”又谓：“辽金国祚所以不及两宋之绵长，因不重视科举，造成文化不及的缘故。”“即辽金尚武而无文。有武力固可建立国家，因无文化则不能延续民族”^③。关于辽代始行科举的时间，邓嗣禹定为：“肇于保宁，而成于统和。”^④杨树藩在上引文中提出：“太宗以来虽偶取进士，皆未成定制，至圣宗时，其制始定。”杨若薇则说：会同（938—946年）初年幽云十六州入辽之后，辽就在当地实行科举取士；至统和六年（988年），始在全国范围内对汉人实行科举。以上三种说法，似以杨若薇所说为得实。杨若薇还认为：辽道宗（1055—1095年）以后，契丹等人也可参加科举，并开设制科，进士登第者待遇优厚，一般汉人“竞相教习，以求登第”，“即使到了辽末国难当头之际，统治者仍把科举作为不可或缺的大事来做”^⑤。杨成鉴和金涛声说：“辽朝的科举比较精简，科目极少。汉族、契丹族、女真族、渤海人都混合参加考试，平等录取。而状元全是汉人和渤海人。不像金元二代，给统治民族以特殊照顾。”^⑥他们的说法也与杨树藩有所不同。

金朝科举较辽代受到重视，不限汉人或女真人，都可应举，据都兴智统计，百余年间，共开科41次，取士6150人。金代科举所以比较发达，都兴智认为：“金代科举不仅说明女真人落后的奴隶制对先进的封建制无法克服，同时也表明女真人在政治上即将走上中原封建制的道路，这也是金政权实现以正统一天下的一个步骤。”他通过对金代科举制度的分析，认为金代科举制度主要是承袭唐宋之制，辽制对它也有影响，但比唐宋“更加严密和完善”。与前代相比，具有9个方面的特点^⑦。杨成鉴等则认为，“南北选取士是金代进士考试的最大特色”，其他“基本上是仿宋的”^⑧。赵冬晖将金之科举分为草创阶段（太宗朝）、发展阶段（熙宗、海陵王朝）和衰落阶段（卫绍王之后）。并认为金廷亦重进士科。金朝科举的积极作用是：“为国家提供了大量人才”，“调和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消极作用是：“选拔人才带有片面性，对当时的文风也有消极影响”^⑨。此外，赵冬晖还对金代开科年份、魁首逐一作了详细考订，做成《金代科举年表》^⑩，颇便研究者参考。有关金代考试科目、内容、方法和中第初任官，则以《辽金贡举制度》一文述说为详。

蒙元科举始于何时，似稍有争论。陈东原根据窝阔台十年（1238年）以论、经义、词赋三科选儒士一事，认为蒙元科举已于此年发端，因该年是戊戌年，故被称为戊戌选试^⑪。日本学者安部健夫认为，当时的知识人士是以宗教人士的身份参加考试的，因此戊戌选试尚不具备科举的性质^⑫。姚大力考察有关史料，折中两说，提出：“把戊戌选试看作元代历史上最早的开科取士，只在很有限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它是元代最早一次恢复科举制度的失败的尝试。”姚大力还由此得出结论说：“科举制度对于大蒙古国的结构模式，完全是一种异

① 《中国考试制度史》，178页。

② 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中华书局，1994年，91页。

③ 杨树藩：《辽金贡举制度》，《宋史研究集》7辑。

④ 《中国考试制度史》，181页。

⑤ 杨若薇：《辽朝科举制度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9年2期。

⑥ 杨成鉴、金涛声：《中国考试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130页。

⑦ 都兴智：《金代科举制度的特点》，《北方文物》1988年2期。

⑧ 《中国考试学》，133—134页。

⑨ 赵冬晖：《金代科举制度研究》，《辽金史论集》4辑，1989年。

⑩ 赵冬晖：《金代科举年表考订》，《北方文物》1989年2期。

⑪ 参见陈东原《辽金元之科举与教育》，《学风》1932年2期。

⑫ 参见安部健夫《元朝的知识人与科举》，《史林》1959年42期。

己元素。因此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它的失敗就是必然的。”^①

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後，選官主要仍然依靠世襲、推薦和吏試三途，科舉遲遲沒有舉行。究其原因，除了蒙古貴族歧視漢人、輕視儒學以外，張晉藩等人認為，還與“忽必烈本身疏遠儒臣，再加上宋末科舉自身的流弊”^②有關。直到皇慶二年（1313年），元仁宗才下詔定次年開始科舉。元統三年（1335年），又罷科舉，歷6年恢復。據楊樹藩統計，有元一代實際只開科16次，取士1139名而已^③。元代科舉包括考試程式、制度，幾乎全部繼承金、宋之制，所不同者：南宋進士分經義、詩賦兩科，元只設一科；考試內容已基本上固定為朱熹的《四書集注》，比前代更為僵化；從考試難易、錄取名額到及第後授官大小，處處充滿了民族歧視。上述情況，除一般通史著作有所涉及外，鄧嗣禹《中國考試制度史》和楊樹藩《元代科舉制度研究》的論述和考訂都相當詳細。其他研究元代科舉制度的論著，也多將科舉制度的廢復、四書文的確立和右左兩榜的異同作為研究的重點。

四 明清科舉制度研究

科舉制度在明清兩代雖進入鼎盛時期，但隨著朝廷腐敗程度的加深，到清朝末年，在改良主義浪潮的推動下，最終被徹底罷廢。香港學者王德昭以為：“科舉考試，在實行的制度上歷代雖有因革損益，然清承明制，即以清代所實施的制度而言，行之也有五、六百年，則其卒遭廢止，其歷史意義及其所生的政治社會的影響的重大，可以想見。”^④這就表明，既然科舉程式和各項规章制度從宋元以來已成定制，自明至清極少變化，科舉制度的重點，勢必由制度本身而轉向它的社會影響和廢止緣由，所以與明代相比，學者對清代科舉制度的研究尤為用心。此外，與明清科舉緊密相關的學校、八股文取士、庶吉士選考等方面的问题，在研究中也受到相當的關注。

有關明清科舉制度的研究成果，首先當推考取清朝最後一科（1904年）進士一甲第三人（探花）的商衍鎰所著《清代科舉考試述錄》^⑤一書最為著名。該書征引史籍88種，參考各類雜誌和私家記錄數十種，並融入撰者個人的應試經歷，故史料翔實，內容豐富，考訂周密，源流畢見，可信程度極高。問世40餘年來，至今仍為國內外研究明清科舉制度的學者所廣泛稱引。其次是王德昭的《清代科舉考試研究》。該書對考試方法和過程的論述雖較簡略，但對明清科舉之異同及晚清廢止經緯，卻研究頗詳。由朱保炯等人編纂的《明清進士題名碑錄》^⑥，則比較完整地收錄了明清兩代歷科登第進士的姓名和籍貫，是迄今為止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明清進士登科記。宋元強所撰《清朝的狀元》^⑦是研究清代科舉和狀元的專著，它在對清代科舉做了一般介紹後，具體分析了中狀元的際遇，開列了清代112科狀元的姓名和履歷。接着對狀元的地域分布、家世遊學、政事德行、著述學識等方面做了詳細探討。此外，除一般通史著作（包括選舉制度的通史）對明清科舉有所涉及以外，國內外專門研究明清科舉制度的論文，大約有五六十篇之多。

明代科舉，始於洪武三年（1370年），到六年，朱元璋將其停罷，改為察舉，十餘年後又告恢復。對於此間原因，郭厚安以為這是朱元璋比較了各種選舉制度以後，“覺得選官辦法，沒有一種是十全十美的，而作為一種經久之制，似乎薦舉的流弊更多”^⑧。關於明代開科次數和狀元、榜眼、探花人數，王興亞經過詳細考證，糾正了《明清進士題名碑錄》所載的一些失誤^⑨。明代科舉考試的內容，普遍認為是“專用四書五經出題”^⑩。對

① 姚大力：《元朝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社會背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2年2期。

② 《中國官制通史》，478頁。

③ 楊樹藩：《元代科舉制度》，《宋史研究集》14輯。按《中國官制通史》473頁載，元朝共開科17次，取士1174人。與楊說稍有不同。

④ 王德昭：《清代科舉制度研究》，中華書局，1984年，1頁。

⑤ 商衍鎰：《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三聯書店，1958年。

⑥ 朱保炯等：《明清進士題名碑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⑦ 宋元強：《清朝的狀元》，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

⑧ 郭厚安：《明初選舉制度述論》，《西北師院學報》1987年4期。

⑨ 王興亞：《關於明代科舉制度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中州學刊》1990年4期。

⑩ 吳晗：《朱元璋傳》，三聯書店，1980年，191頁；李鴻：《明清科舉制度與封建專制主義》，《內蒙古大學學報》1983年2期。

此,王兴亚也提出不同看法,他说:有明一代的各级科举考试都不是专从四书五经出题的,其中乡试、会试、各试三场,“既要考第一场经义考试成绩,又要考第二场论判诏诰表等、第三场经史时务策的考试成绩,只有三场考试成绩均达录取标准,才得录取。”^①

科举和学校相结合,取消乡贡,改由学校输送官员和应举人才,这是唐宋统治者希望实现而一直没有实现的计划。到了明代,这一计划才得以完全实现,“学校便成为参加科考的必由途径”^②。于是,研究明代国子监和府州县各级学校的设置(场所、校规和教官)、考试(童试、乡试和国子监试)、出身(生员、举人和监生)及学生待遇,便成了研究明代科举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关内容,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清代科举制度研究》和《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等书中都有极为详细的论述。

宋元科举,士子经殿试后,各项考试就全部结束,但从明代起,殿试发榜后,中式进士便分甲授官,除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外,二、三甲进士可以再参加翰林院的考试,称为“馆选”,考取的就称为庶吉士。清代称馆选为“朝考”。但商衍鎏以为,自明弘治四年(1491年)起,考庶吉士者事先须根据平日所作文字,呈礼部考订,择优再行考试。至清代,则有分省选庶吉士和大臣奏荐之制,但一般仍选而后试。乾隆时,废保举之制,又改选而后试为试而后选,成为定制。商衍鎏又说:“选用之法,合覆试、殿试、朝考等第之高下统计,等第中尤以朝考为重,三试高列者用庶吉士,此通例也。……等第次者分别用为主事、中书、知县三项。”^③其研究之精细,远较他书为详。

清代科举,无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考官、场规、命题范围、分甲授官以及学校和科举的关系等,一如有明之制。对此,《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都分别做了详细论述,此外,该书还对废除科举以后的各项考试、武科和翻译科的考试、附属于科举中的各项考试、八股文、科场案件和轶闻,也都一一做了介绍。

在清代,对科场舞弊行为的防范和惩治,虽然达到空前严密和残酷的程度,但科举的腐败程度却超过了前代。胡果文对这两方面看似矛盾的现象,做了如下解释,他说:“清代科举制度显然在前几代封建王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达到高度成熟的境界。一方面它强调公开的原则;公正的原则;竞争择优的原则,具有客观公正性。另一方面它又始终处于封建皇权的支配之下,强调忠君的原则;人治原则;平衡的原则;注重职业出身的原则,又具有相当的主观随意性。这种二律背反的主导原则,使清代科举制度不可能比前朝有更大的作为。”^④

八股文取士被认为是明清科举制度最为严重的弊病,所以它一直成为研究明清科举制度的一个重点。

关于八股文的源流,各家说法大同小异。商衍鎏认为:王安石改革科举,以诗赋代替经义,实启八股文取士的先河。南宋某些士大夫所作之文,“直与八股文无疑”。元之考试,由《四书》内出题,“是即四书文之所由昉”,最后“定于明初,完备于成化”^⑤。侯绍文也说八股文肇始于王安石的经义考试,并以为:“按元仁宗所定之科举考试方法,限定四书内出题,限定要用朱熹集注,又作文限定字数,此皆与后世科举用八股作文之方法相同。”^⑥邓嗣禹则概括为:“时文之体,滥觞于宋,行于元,而大定于明。”^⑦不过,对王安石提倡用经义取士与八股文的关系,有学者提出异议,他们说:“王安石时代的经义还与论体相仿,和后来的八股文有很大的不同。”^⑧张希清也说:“有人认为,八股文始于王安石的大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熙宁时期的大义,在内容上不拘泥于经文和注疏,也不是‘代圣贤立言’,而是强调阐明经旨,自陈己见;其文体为散文,没有什么固定的格式,更不要求必须对偶排比。”^⑨对“大定于明”的时间,各家看法也不完全一致,翦伯赞等人以为,以八股文取士始于洪武三年(1370年)^⑩,但多数学者以为,八股文的正式形成是在明成化年间^⑪。

① 《关于明代科举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② 《科举史话》,23页;《中国历代选官制度》,287页。

③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126页。

④ 胡果文:《清代科举略论》,《江汉论坛》1989年7期。

⑤ 参见《清代科举考试述录》,227—230页。

⑥ 《唐宋考试制度》,294页。

⑦ 《中国考试制度史》,282页。

⑧ 王道成:《科举史话》,87页。

⑨ 《中国科举考试制度》,90页。

⑩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下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197—198页。

⑪ 参见《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185—186页。

八股文的格式，對於明清士人來說，可謂耳熟能詳，人人皆會，但對今人來說，已變得十分陌生，甚至成了研究課題。為此，《清代科舉考試述錄》、《清代科舉考試研究》、《科舉制度與中國文化》論著都做了專門的介紹。

明清統治者為什麼要用八股文取士？一般學者認為，這是為了施行文化專制主義和傳播理學名教、箝制知識分子的思想，以維護封建統治。如李鴻說：“明清兩代控制知識分子的方法雖多，但最基本的手段則是八股科舉。八股本是窒息一切生動活潑思想的僵硬模式，而知識分子對八股的頂禮膜拜最後又必然歸結為對封建君主專制的頂禮膜拜。”他同時分析了以八股文取士的嚴重後果，認為“在政治上、文化上起著進一步強化封建專制主義的作用”。社會後果則有兩個方面：“首先是阻礙社會進步，使明清封建社會變得更加腐朽僵化、停滯不前”；“其次是嚴重摧殘人才，限制了我國科學技術和文化教育的發展”^①。李鴻的上述觀點，基本上代表了以往學者對八股文的評價。為什麼通過八股文考試而錄取的進士中，也能產生許多科學家、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呢？對於這一現象，文元珏借用清人黃宗羲的“探籌”說做了解釋，認為這只是一種偶然現象而已^②。

雖然清朝統治者也知道以八股文取士的弊端，康熙二年至六年（1663—1667年）曾一度加以停罷，乾隆時也有大臣提議要將它廢除，但最後還是保存了下來。對此，近十年來有學者從更深層次上探討了其中的原因，認為當從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進行考慮：“就內容而言，這種僵化的形式便於控制人們的思想，使考生只埋頭死讀‘聖賢書’，以強化封建統治”；“從形式而言，八股文也有其特殊的功能”，這就是：“第一，防止作弊”；“第二，試卷的格式固定，考官易於評審”；“第三，一定程度上能考驗舉子的文字基本功”^③。張希清也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它適應了封建統治者實行文化專制主義，維護封建統治的需要；其次是因為它還適應了試卷程式化、標準化的需要。”^④

八股文到底有無學術價值？近百年來，人們或從對科舉制的極端不滿出發，或受特殊政治氣候的影響，都將它說得一無是處。但也有少數學者以為，不能完全否定八股文的文學價值，如周作人說：“八股是中國文學史上承先啟後的一個大關鍵。……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駢散的菁華，凡是从漢字的特別性質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藝也都包括在內，所以我們說它是中國文學的結晶。”^⑤朱光潛說：“我頗覺得八股文也有它的趣味。它的布置很勻稱完整，首尾條理線索很分明，在狹窄範圍與固定形式之中，翻來復去，往往見出作者的匠心。”^⑥

到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實行近1300年之久的科舉制度最終被廢除，並為學校所代替。對科舉制度廢除的經過，《清代科舉制度研究》中“新時勢·新教育·與科舉制度的廢止”一章論述甚詳，在維新派人士的呼吁下，“清政府之認真考慮變通科舉，乃在海禁開後，西潮迫來，國家處境大變，新時勢要求新人才，而新人才的作育要求新教育。傳統的科舉考試既無以應新時勢的要求，於是新學校建立，卒至取明、清兩代之已數百年的學校與科舉制度而代之”。沈其新將科舉制度被廢除的原因歸納為四個方面：“首先，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是科舉制度廢除的基本原因”；“其次，廣泛興辦的新式學堂是科舉制度壽終的直接原因”；“再次，日趨沒落的書院制度加速了科舉制度的廢止”；“最後，社會心理的變遷，促成了科舉制度的消亡”。他認為清代廢除科舉制度意義重大，“是中國教育史上劃時代的一件大事。它打破儒學一統天下的局面，並標誌著封建時代的舊教育制度在形式上的結束，新的近代教育制度正式確立。科舉制度的廢除加速了西方近代科學文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並促進新知識分子群的形成”^⑦。

五 對科舉制度的歷史評價

無論在近代還是今天，人們對科舉制度歷史功過的評價，由於着眼點不同，可謂大相逕庭。否定科舉制度者，主要是從科舉只問才能不問德行和考試內容之無用這兩個方面着眼，尤其到明清時以八股文取士，束縛了

① 李鴻：《明清科舉制度與封建專制主義》，《內蒙古大學學報》1983年2期。

② 《論八股文的源流及其歷史意義》。

③ 陳茂同：《中國歷代選官制度》，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770—772頁。

④ 《中國科舉考試制度》，89頁。

⑤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附錄一《論八股文》，北平人文書店，1932年。

⑥ 朱光潛：《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朱光潛美學文學論文選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⑦ 沈其新：《清末科舉制度廢止評述》，《廣州研究》1987年11期。

知识分子的思想,严重败坏了人才,被认为是科举制度的主要弊病。有关研究成果,我们在前面已经做了回顾。

因为科举制度在晚清受到全社会的鞭笞,所以进入民国以后,人们都讳言这种制度还有什么优点。当时的研究者多将“科举”改称为“考试”,以示区别。到50年代至70年代,又由于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研究科举制度的论著,揭露其弊病的多,做出些微肯定的几乎没有。如商衍鎤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的最后结论是:“科举仅余糟粕在。”^①就是典型一例。

近20年来,史学界在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对科举制度开始有了新的认识。长期主管国家考试中心工作的杨学为,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他说,“过去曾认为科举几乎一无是处,现在从事考试工作,有了一些体会,又查了一些资料,感到原来的认识不全面。并提出:‘如果(戊戌)变法成功,剔除了科举考试的陈腐内容与僵化形式,使之适应维新的需要,历史也许会另一种样子。’”^②现在,不少学者认为,科举制度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与以往包括察举制度在内的封建社会所有选举制度相比,却有其进步性和合理性。它造成了“社会流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封建政治;至于科举的一整套严密的考试程式和制度,更被誉为是中华民族的杰出创造,有人甚至断言:“从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来说,科举制可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③

何忠礼通过对科举制和察举制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察举制远比不上科举制进步和合理。科举制“虽说也有不少弊病,但它使应考之人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这对于调动人的积极因素,广泛搜罗人才,有着无可辩驳的优点。以考试取士,权在国家,考取者无私恩,黜落者无怨恨,亦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政治的清明。”并认为今天仍有批判地继承的必要^④。胡果文联系现实,指出当前所实行的干部委任制,存在着以往察举制的某些流弊,力主借鉴以科举选拔人才的方法,他认为,委任制无助于党风、政风和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并建议在全面批判借鉴科举制度和文官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干部任用制度的新模式^⑤。

在海外和港台地区,对科举制度的评价也在发生变化。沈兼士在钱穆论述唐代科举制度意义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认为科举制度具有五个优点:“(1)是用一个客观的考试标准,挑选人才,使之参预国家政治”;“(2)是根本消融社会阶级的存在”;“(3)是促进社会文化的向上”;“(4)是培植全国人民对政治兴味底原动力,而增加其爱国心”;“(5)是促进国家政治的大一统组织”。他指出:即使清代科举,也完全是由于其考试内容造成的,“并非考试的本身有问题”^⑥。

虽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科举制度始终处在受批判的地位,但有人还是承认它对社会流动起过促进作用。半个多世纪前,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曾研究过科举与社会流动的问题,他们通过对清代915本贡生、举人、进士的朱墨卷(因为卷首载有应试者的履历)调查统计,发现在这些人中父辈无功名的占33.44%,而连续五代都无功名的布衣子弟也有122人,从而说明“科举制度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和一定程度的竞争性,造成封建社会的人才流动”^⑦。这就是说,有一些平民通过科举考试可以上升为统治者;另一些官宦子弟却因科举失利而沦为平民。何炳棣和柯亨格等人也有类似的看法,他们说:“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官僚贵族是依靠官职和考试而获得地位的,考虑到考试及格的困难,官僚贵族的构成是有很大大流动性的”。

但是,科举造成“社会流动”的观点也遭到美国学者哈韦尔和海姆斯(Hymes Robert)等人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上层阶级的成员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然后可以获得教育和官职”;“流动性论点把注意力狭隘地集中在父方直系上,而忽略了世族、婚姻关系、甚至兄弟姐妹叔伯等重要因素。”^⑧所以他们认为:“科举考试差不多对于社会流动产生不了作用的,统治阶层依靠家族势力及彼此互相通婚长保其势力,可长达十余代之久。”对于哈韦尔等人的观点,李弘祺一方面说:“我和大部分学者(包括大陆和日本)都较难以接受这个看法。”^⑨另一方面又认为:“直接受科举影响的人数确实很少,因此科举考试无助于产生非常重要的社会流动。相反地,

①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352页。

② 杨学为:《对科举的再认识》,《高考、会考改革资料汇编》,学苑出版社,1990年。

③ 刘海峰:《科举制——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探索与争鸣》1995年8期。

④ 何忠礼:《荐举制度与考试制度优劣之比较》,《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⑤ 参见胡果文《清代科举略论》,《江汉论坛》1989年7期。

⑥ 沈兼士:《中国考试制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191页。

⑦ 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清华大学)4卷1期,1947年。

⑧ 参见《宋代科举》,14—15页。

⑨ 《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中译本《导论》。

由於它創造和維持地方上的‘士紳’家族，對缺乏勢家背景的平民進行向上社會流動遂造成一種潛在的和更大的阻礙力。”^①

宋元強卻認為科舉取士確實造成了社會的流動，他通過對有清一代 114 名狀元中家世可以查考明白的 57 名狀元出身的抽樣調查，以事實說明了科舉制度“不拘門第、均等競爭、公開考試、優勝劣汰的基本特徵”。他說：“倘若與西周、兩漢、魏晉時期的選官制度相比較，科目選士所具有的競爭機制，是不容忽視的。一定程度上的均等競爭，推動了不同等級成員之間的流動，為歷代統治者甄拔了一批又一批的臣僚百官，對我國封建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發現，在這 57 名清代狀元中，出身於官僚家庭的占 51%，出身於平民家庭的占 49%，平民子弟入仕人數幾乎占了一半左右。按理說，統治階級在選舉中總要照顧到本階級的利益，可是為什麼自唐宋迄明清，科舉制度一直成為封建政府採用的主要選官方式，均等競爭的原則沿用不衰呢？宋元強以為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原因：“第一，封建社會內地主階級逐步更新，自宋至清，品官地主、官紳地主、庶民地主漸處支配地位，科舉取士適合他們的政治與經濟需要”；“第二，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不斷完善，實行科舉取士制度，有利於強化皇權”；“第三，受傳統儒家教育的士階層不斷擴大，籠絡士人有助於社會的穩定，擢拔有才能的士子利於建立強有力的統治階層”^②。

許多學者還專門研究了中國科舉制度對世界各國的影響。

首先，對周邊國家特別是對朝鮮半島和越南的影響。台灣學者朱雲影指出：“高麗光宗九年（958 年），採納後周使臣雙翼的建議，開始實施科舉，設制述、明經二科，前者即唐之進士科，試策論和詩文，後者得試帖經墨義。”還通過考證證明，越南李朝英宗（1138—1175 年）首開其端的科舉取士，也是受中國影響的結果^③。

其次是中国考試制度的西傳和對西方文官制度產生的影響。雖然考試並非科舉所獨有，但應當承認，西方是通過了解科舉考試才了解中國的考試制度的。早在本世紀 20 年代，孫中山就斷言：“現在各國的考試制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制度，原來還是從我們中國學過去的。所以中國的考試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④進入 40 年代，鄧嗣禹對中國考試制度的西傳做了詳細考證，通過各種文獻資料證明中國科舉制度對法國考試制度和文官制度所產生的影響，他說：“早在一五七〇年歐洲就有些學者知道中國的政治制度與考試制度。……其後，法國學者布倫退耳又承認法國教育實在是奠基於中國公開的學術考試制度之上，並認為法國文官考試制度的思想無疑也是淵源於中國的制度。”鄧嗣禹同時研究了英、美等其他西方國家考試制度和文官制度的產生情況，指出它們也都是直接受到中國考試制度影響的結果^⑤。1983 年，當時出任美國人事總署署長的區歐·坎貝爾应邀來北京講學時曾說：“當我被邀來中國講授文官制度的時候，我感到非常驚訝，因為在我們西方所有的政治學教科書中，當談到文官制度的時候，都把文官制度的創始者歸於中國。”^⑥

最後，還得提一下有關科舉史料的編纂問題。為了更好地推動對中國古代選舉制度史特別是科舉制度史的研究，海峽兩岸都出版了有關中國古代選舉和考試的史料選編，其中以楊家駱主編的《中國選舉史料》（台灣鼎文书局，1977）和楊學為等人主編的《中國考試制度史料選編》（黃山書社，1992）二書的內容最為豐富，頗便學者查考和研究。另外，由龔延明主編的《歷代登科總錄》也正在編纂之中，書中對每一個登科人物都做有小傳，記載他們的基本履歷，規模十分龐大。該書一俟出版，對研究歷代科舉制度和登科人物將會有很大的幫助。

〔作者何忠禮，1938 年生，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歷史系 310028〕

（責任編輯：高世瑜）

① 《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263 頁。

② 宋元強：《清代的科目選士與競爭機制》，《中國社會科學》1993 年 2 期。

③ 朱雲影：《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1 年，427—432 頁。

④ 孫中山：《五權憲法·民權初步》，民治書局，1928 年。

⑤ 鄧嗣禹：《中國考試制度西傳考》，載《鄧嗣禹先生學術論文選集》，台灣食貨出版社，1980 年。

⑥ 參見桑玉成等《當代公務員制度概述》，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 年，17 頁。